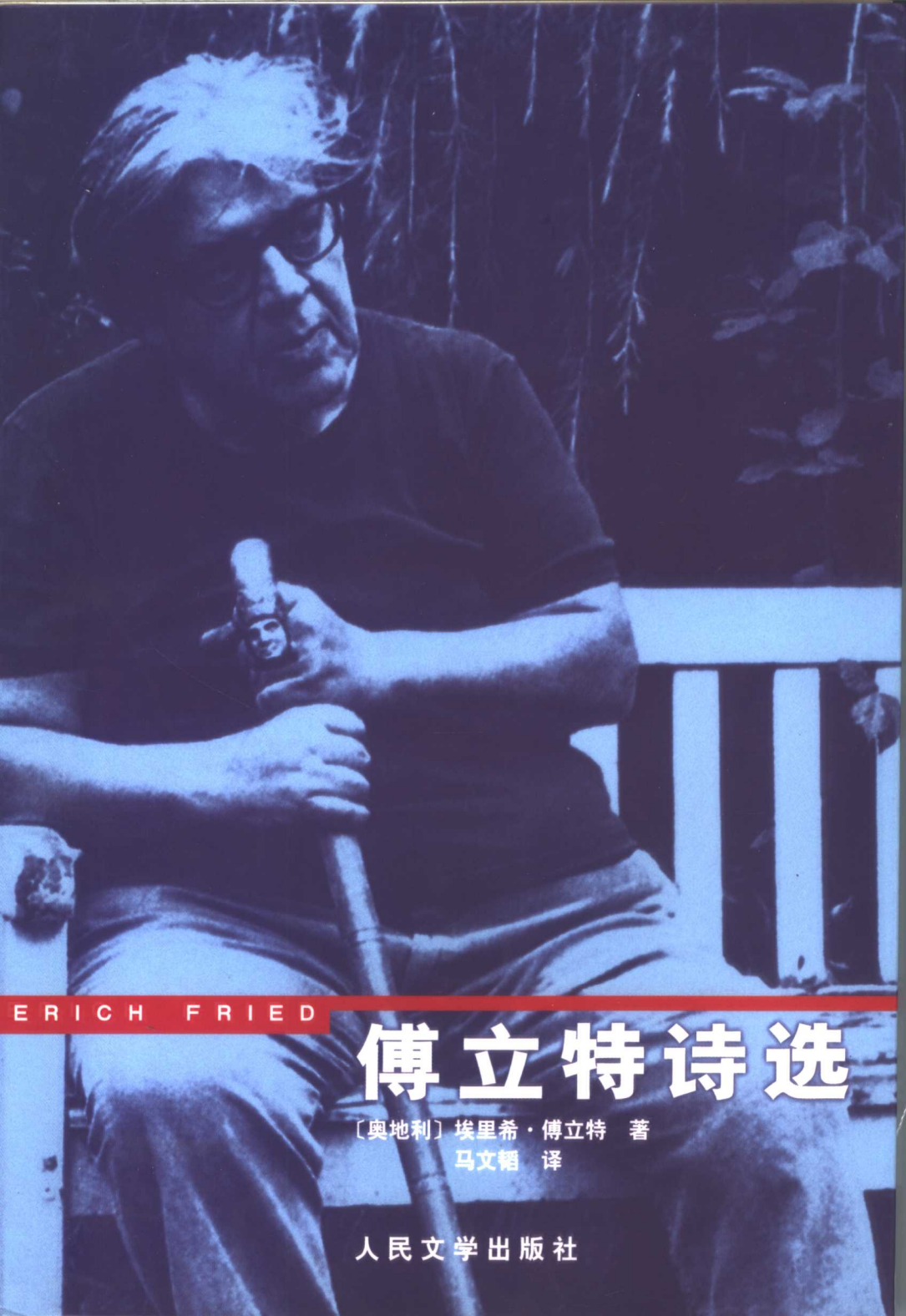




ERICH FRIED

傅立特诗选

〔奥地利〕埃里希·傅立特 著
马文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傅立特诗选

〔奥地利〕埃里希·傅立特 著
马文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Ausgewählte Gedichte von Erich Fried

© Erich Fried, Gesammelte Werke in 4 Bände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Berlin 1993
Einzelnachweis der Gedichte s. Liste anbe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立特诗选/(奥)傅立特著;马文韬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02-004592-8

I. 傅… II. ①傅…②马… III. 诗歌-作品集-
奥地利-现代 IV. 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528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杨 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傅立特诗选

Fu Li Te Shi Xuan

[奥地利] 埃里希·傅立特 著

马文韬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592-8/I·3502

定价 22.00 元

驱散覆盖世界的语言迷雾(代前言)

——浅谈傅立特的诗歌创作

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埃里希·傅立特(Erich Fried, 1921—1988)在父亲被法西斯杀害后,为躲避迫害,离开故乡维也纳流亡到伦敦。这里管理犹太流亡者的机构问他将来有何打算,傅立特说:“我想成为一个德语诗人。”人们当即劝告他立刻打消这个发疯的念头,越早越好。然而这个年轻人坚持自己的理想,四十年代中期便开始在伦敦出版诗集:《德国》(1944)和《奥地利》(1945)。如果说这是年轻人练笔之作,那么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他开始了持续不断的诗歌创作。自一九五八年首次在联邦德国出版《诗歌》起到一九八八年去世的三十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两本诗集问世,例如:《石头王国》(1963)、《警告诗》(1964)、《还有越南还有》(1966)、《侵扰》(1967)、《时代问题》(1968)、《在次要敌人中间》(1970)、《开口讲话的自由》(1972)、《听我说,以色列!》(1974)、《五花八门的半成品》(1977)、《就这样我来到德国人中间^①》(1977)、《爱情诗》(1979)、《生活的阴影》(1981)、《寻求接近》(1982)、《恐惧与慰藉》(1983)、《不安》(1984)、《明辨》(1985)、《拒绝遗忘》和

① 本诗集标题来自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居者》第二卷第二部许佩里翁给朋友贝拉尔明第六封信的第一句话。

《在我们时代的边缘》(1987)等。

傅立特的诗歌数量大,他诗集的销量也相当可观。德国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曾说:“傅立特的一本本诗集发行量之大令他几乎所有的竞争者嫉妒得脸色苍白,他的《爱情诗》在短时间里就销售了六万多册。”他的诗为人所喜爱且常被引用的也多;在德国的公开场合,比如柏林墙上或者办公室的墙上常常能看到傅立特的诗句,他那首传播很广的诗《我就是我这样》不但是诗歌朗诵会上经常听到的作品,而且还有人把它写到床单上挂到树上,以至于消防队不得不特别出动将它取下。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哈根市市郊一个桥洞的墙壁上人们也曾读到过这首诗:

我就是我这样

是胡闹

理智说

我就是我这样

爱情说

是不幸

思忖说

是永远的痛苦

惶恐说

是毫无希望

认识说

我就是我这样

爱情说

可笑至极

自豪说

轻率无比

谨慎说

不现实的虚幻

经验说

我就是我这样

爱情说

傅立特这首诗讲的不仅仅是爱情,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人们心中沉积的教条和成规,把自我从高大的围墙中解放出来,而且诗中那些矛盾和对立的并未具体化的声音等待人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愿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去填充。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傅立特用一年中一半以上的时间到德国和奥地利参加文学与社会政治活动,举办作品朗诵会,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这位身材不高、走路有点不稳的诗人深受听众的欢迎。他的声音浑厚、富有表现力,他的话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紧紧地吸引和征服着听众。

人们称诗人傅立特是位拥有爱心、精神和愤怒的富翁,这一评价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他的创作。

童年时代的傅立特就以早熟、善于思考和富有斗争精神而颇为与众不同,六岁半就写了一首对传统的家庭权威教育持异议的诗:

一个孩子

不是一头牛

一个孩子
快捷得
好像一阵风

他听的
打扰你们
他想的
伤害你们
他问的
你们不高兴
他叫喊的
是你们的真实

.....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还未上学的傅立特就目睹了“血腥星期五”事件,八十五名游行示威者死在警察的枪口下^①。这年圣诞节学校的庆祝会上有傅立特的朗诵节目。当他站在台上听到有人说维也纳市警察局长在场时便说,他在“血腥星期五”曾看到被担架抬走的死伤者,在警察局长面前他不能朗诵诗歌,致使后者恼怒而去。

① 1927年1月23日,在奥地利沙滕多夫,半军事组织“祖国保卫同盟”和“前线战士团”发生冲突,一名四十岁的残废军人和一个八岁的孩子被射杀。7月14日,三名开枪者在陪审法庭上被判无罪。7月15日(星期五),维也纳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愤怒的示威者放火焚烧了司法大厦。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维也纳市警察局长约翰·朔贝尔在市长卡尔·赛茨同意后命令警察向群众开火,打死八十五名示威者。冲突中有五名政府成员和警察丧生,数百人受伤。事发当天,维也纳的交通陷入瘫痪,傅立特和母亲被困在街边的一家商店里,透过橱窗他看到了惨案中的牺牲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在合并于纳粹德国后有计划地迫害犹太人,迫使许多犹太人流亡国外。傅立特在英国接触了不少对德国人持极端否定观点的流亡组织。傅立特反对这种极端的看法,他在一九四六年开始写的小说《士兵与姑娘》讲的是一个出身犹太家庭的美国士兵与一个被判死刑的纳粹集中营女看守之间的爱情故事,他还写下不少诗歌希望帮助克服这种教条主义观点。

与众不同的立场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孤独的没有家园的人,这不仅因为他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异国,不仅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战后也未回到德语国家定居。奥地利保守的文学气氛、联邦德国的某些极右政策,以及民主德国文化上的教条主义都使傅立特决定继续留在伦敦,尽管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已发出请他任教的邀请。

傅立特的某些观点导致他在思想和精神方面陷入颇为孤立的境地,但这并未使诗人转向一个局外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令他脱离现实,远离社会,他脱离的实际上只是派别、党团和教条的意识形态思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傅立特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蓬勃兴起的抗议战争和反对压制民主的群众运动使傅立特强烈感到与民众交流的渴望,除了谈话、演讲,最好的形式就是写诗,他被强烈的表达欲望所驱使,正如汉斯·迈耶尔^①在傅立特葬礼上讲话中指出的,对傅立特来说,生活和讲话、生活和写作是一回事。傅立特不同意当时所谓“文学的死亡”这种提法,他认为

① 汉斯·迈耶尔(Hans Mayer, 1907—2001),德国文艺学家。著有《毕希纳和他的时代》(1947)、《从莱辛到托马斯·曼》(1959)、《理性的黄昏》(1990)、《巴别塔——回忆民主德国》(1991)等。

文学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可代替和大有作为。

傅立特始终关注着德语国家以外的世界,他批评美国在朝鲜、多米尼加^①和越南的侵略行为,谴责英、法、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的侵略战争^②。作为犹太人的傅立特对以色列在“六日战争”^③中虐待战俘的暴行也毫不姑息,在《听我说,以色列》一诗中他写道:

当我们受到迫害时
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员
如果你们变成迫害者
我怎能还同你们在一起
.....

你们是浩劫的幸存者
残酷的迫害者已经灭亡
难道他们的残忍无道
如今又在你们的身上继续?
.....

不论奥斯维辛集中营、越南战争,还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学生运动、新纳粹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自然环境的破

① 1961年,美国出兵占领多米尼加,成立殖民政府。1965年4月28日,美国再次入侵多米尼加。

② 1956年,英、法、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的“苏伊士战争”,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③ “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以色列突袭埃及、约旦、叙利亚等三个阿拉伯国家,占领了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领土。战争中共有一百万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

坏,都是傅立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他要用诗歌把他的思考告诉人们,实施思考的前提是他的怀疑精神。童年时代,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对怀疑的赞颂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怀疑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无知者认为已经找到了真理”这些话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一九八三年,为启发某些左派作家摆脱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写下了《卡尔·马克思一九八三》这首诗:

如果我怀疑
那个曾说
他最喜欢的格言
是“要怀疑一切”的人
那么我就是在跟随他
.....

那些要证明
每个字还是否有效的
死抠条文的人
证明了他是多么正确
.....

德国女诗人乌拉·汉^①说:“埃里希·傅立特是个天生的释疑者。”不仅因为他自幼善于思索,成年后所处的复杂环境更迫使他深入观察和思考,而且因为他找到了进行怀疑和思考的适当形式,那就是所谓话语和思考的游戏。

① 乌拉·汉(Ulla Hahn,1946—),德国女作家。著有诗集《游戏者》(1981)、《欢乐的火焰》(1986),长篇小说《房子里的男人》(1991)、《隐藏的词语》(2001)、《模糊的图像》(2003)等。

像内莉·萨克斯^①和保尔·策兰^②一样,傅立特长期生活在非德语区。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他译过二十七部莎士比亚戏剧和狄兰·托马斯、约翰·米林顿·辛格、约翰·阿登、阿诺德·韦斯克^③、T.S.艾略特等的作品)以及他的职业(1952—1968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德语部工作)都使他不断地熟练掌握母语,并且因为不受日常交际的影响,他的语言得以保持诗歌所要求的纯洁和精炼。生活在两种语言中使他对德语的构造特性和表达方式非常敏感,为他在诗歌创作中游戏语言打下了基础。语言和思考游戏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利用同词根异义词(Paronomasie),或者把一些词形相近、词义相去甚远的词放在

① 内莉·萨克斯(Nelly Sachs, 1891—1970),瑞典籍德国女诗人。生于柏林一犹太家庭。1940年与母亲逃往瑞典。其他留在德国的亲人死于集中营。其作品反映了犹太民族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所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命运,诗风沉痛悲怆。著有诗集《在死亡的寓所里》(1947)、《星辰黯淡》(1949)、《进入无尘之境》(1961)等。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保尔·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诗人。生于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的切尔诺维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属奥匈帝国,一战后属罗马尼亚,1947年起属苏联,1991年起属乌克兰)一个说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杀害。1948年移居巴黎,入法国籍。1970年在巴黎自杀。代表作有诗歌《死亡赋格曲》(1945)、《语言栅栏》(1959)、诗集《罂粟与记忆》(1952)、《从门槛到门槛》(1955)等。

③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英国作家、诗人。1943年起任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和撰稿人。1953年在美国死于诗歌朗诵途中。著有诗集《爱的地图》(1939)、《死亡和入口》(1946)、散文集《像小狗样的艺术家的肖像》(1940)、广播剧《在奶树林下》(1954)等。这位威尔士的天才诗人是傅立特的朋友。傅立特欣赏其诗风。他们在对诗的理解和创作中不乏共通之处。

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著有悲剧《骑马下海人》(1904)、喜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补锅匠的婚礼》(1908)等。

约翰·阿登(John Arden, 1930—),英国剧作家。作品有《人生》(1956)、《巴比伦的泉水》(1957)、《像猪一样生活》(1958)、《假自由》(1965)等。

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 1932—),英国剧作家。“愤怒的青年”中的重要作家。曾创立向工人传播文化的“第四十二中心”。作品有《大麦鸡汤》(1958)、《根》(1959)、《我在谈耶路撒冷》(1960)等。

一起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这种诗难以翻译,或者根本就无法译成与德语区别太大的汉语。除此之外,傅立特喜欢运用意义渐进(Klimax)、词语互联、句型重复、交错配列(Chiasmus)、转换视角,以及改变俗语、成语等方法,比如交错配列:

附加条件

重要的
不仅仅是
一个人
思考
正确

而且是
那个
思考
正确的
是一个人

另一首题为《误解》的诗则体现了视角的转换:

谁目不转睛地
注视自己的恐惧
人们就说:
他想必
特别的
勇敢

但是
并不是
他的勇气一定很大
只是因为
那恐惧
抓住他的眼睛不放

句型重复有时逐渐变成不太在意的机械性重复,最后句中应该重复的部分突然不重复,出人意料的效果好像中国相声运用的抖包袱:

石头时代

植物时代
然后到来的是动物时代
然后到来的是人类时代
然后到来的是石头时代

谁听到石头讲话
谁就知道
只有石头将持续存在

谁听到人类讲话
谁就知道
只有石头将持续存在

傅立特的语言游戏、思考游戏首先是为了自己,让自己弄清楚自己的所感所想,同时如他所说,为给自己增加勇气,或者为

能做到既不迟钝也不绝望,为了不让自己被世界上的不公正和卑鄙行为气得爆炸。他认为诗人也是普通人,触动诗人的事物也应该能够触动他人。萨特认为“说话即行动”,哈贝马斯说“认识具有不可否认的语言性”,傅立特通过语言和思想游戏打破陈旧观念和思想方式,让自己和他人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所处的这个世界。

一九六四年的《警告诗》和一九六六年的《还有越南还有》两本诗集突出地体现了这个特点,确立了傅立特在德语国家诗坛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两本诗集也标志着现代德语诗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傅立特自一九六三年开始参加“四七社”^①的活动,在这里他更直接地接触到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观念,比如“砍光伐尽”、“废墟文学”、“策兰的神秘诗歌”、“卡夫卡风格”,以及“语言的批判”和“具体诗”等等。一九六六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召开的“四七社”年会上,作家们发生了严重分歧。君特·格拉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认为“积极干预现实的文学”是乌托邦。彼得·魏斯^②反对只为艺术而写作,坚持认为把自己的声音传给被压迫、被剥削

① “四七社”(Gruppe 47),德国文学团体。作家和评论家汉斯·凡尔纳·里希特、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瓦尔特·科尔本霍夫等1947年创建于慕尼黑。旨在促进德国战后新文学的发展,扶持青年作家。每半年聚会一次(1956年后每年一次),每次二至三天,由会员朗读自己的作品,其他人对作品当场进行评论。1950年起设文学奖,获奖者有君特·艾希、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约翰内斯·博布罗夫斯基等。“四七社”对战后德语文学影响颇大。1967年第二十九次会议后宣告停止活动。1977年解散。

② 彼得·魏斯(Peter Weiss, 1916—1982),瑞典籍德语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马车夫的身影》(1960)、《反抗的美学》(1975, 1978, 1981),剧作《马拉遇刺记》(1964)、《调查》(1965)、《论越南战争的来龙去脉》(1968)、《托洛斯基在流亡中》(1970)和《荷尔德林》(1971)等。

的民众是作家的责任。傅立特在会上发言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作家更应该防范套话以及导致套话的、已成习惯的思维模式。他说,去觉察自己的套话和虚伪的言辞,觉察自己意识构建中的不确切性,对于作家来说特别重要。这表明傅立特找到了那个时代里适合自己的语言,走上了一条新的诗歌创作道路。

尽管如此,有些批评家还是把他视为只用抽象思想进行政论和说教的政治诗人。一九六六年,《还有越南还有》的出版遇到了困难,很多出版社不愿出版这本诗集,刚成立两年的克劳斯·瓦根巴赫出版社以不同寻常的远见和胆识出版了他的诗集,从此开始了诗人傅立特与这家出版社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如果人们认真地读傅立特的所谓政治诗,会发现正是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政治诗歌的看法。特奥多尔·阿多尔诺^①在一九四九年说过,“奥斯维辛以后,写诗就是野蛮”,这不意味着他完全否定诗歌。在谈到晚期资本主义艺术时,阿多尔诺认为艺术只有拒绝它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只有真正是独立的(即自主的),它才能完成其批判社会的任务。在形式方面,艺术作品必须反抗人们已经熟悉的思维和感受形式,只有通过反抗(即否定)流行的、众人所接受的东西,通过反抗陈规俗套和顺时趋势,真正的艺术才能产生。

傅立特自六十年代起所写的诗歌表明,他正是主张文学艺术应该从政治宣传中解放出来,应该致力于人的发展,开阔人的感受、思想和行为方式,把人引向自我和一个解放了的社会。

他的诗歌体现着他对语言的怀疑和批判,他指出语言的欺

① 特奥多尔·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

骗及后果,但他没有走向完全否定语言的极端。语言把现实世界掩盖起来,傅立特凭借他对语言的敏感能透过语言感觉世界,然后用最简单最基本的语言元素给他的感觉以形式,所以在他的诗中视觉形象是罕见的,取而代之的是语言形象,可以说它比一切更真实,比一切经验更现实。他诗中的语言具有独立和民主的品格,与权威和说教相反,他是要读者去仔细倾听、去自由地感受和联想,去辩证地思考和批判,让语言行使它作为不可替代的交流工具的基本功能。

比如那首被称为经典之作的、以越南战争为主题的诗:

加入国籍

白手

红头发

蓝眼睛

白石头

红血

蓝嘴唇

白骨头

红沙土

蓝天

每节三个诗行开头的“白、红、蓝”三个字可以认为代表美国国旗的颜色,美国士兵的尸骨留在了异国他乡,战争对任何一方的民众都是灾难。

这首诗简单得没有句子,只是一些带有最普通形容词的最常用、最基本的单词,但透过这些词语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残

酷、生命的毁灭,让人们感到了诗人的愤怒。

七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文化艺术领域明显地出现了非政治化倾向,文学家、诗人回归个体和自我,文学进入了所谓“新自我主义”。

由于傅立特始终坚持反对异化、关注人生,所以六十年代他的文学创作没有走向极端,七十年代以来也没有悲观和消极;他以前没有夸大文学的作用,现在也没有低估文学的作用,他相信文学对社会发展的某种影响,认为能改变哪怕是一个人的心灵和精神,都有助于或多或少改变我们的世界。因此在他的诗歌中仍然去触及那些敏感的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敢于怀疑那些被视为神圣的、不可打破的禁区。比如在七十年代,他谴责联邦德国出现的恐怖主义活动,但他同时也反对联邦德国匆忙地制定“反恐怖法”和颁布“镇压极端主义者法令”,以及藉此加强言论检查,限制基本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反对借镇压恐怖活动之名违反法制、滥用暴力压制舆论、排除异己。他曾毫不畏惧地在《明镜周刊》上撰文为因反对政府以上做法而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伯尔的家一度被佩有重武器的警察包围)进行辩护。他自己也曾由于批评当局而被传讯,在法庭上傅立特坦诚陈述他对自我的认识,认为作为一个积极干预现实的作家,与异化和物化作斗争是他的主要任务,他要努力反对在联邦德国到处泛滥的、非友即敌的简单化思想。他所说的到处泛滥也包括在“朋友”即左派作家内部。比如他在一九七〇年写的《单独继承者之间的冲突》一诗:

我的马克思将拔掉
你的马克思的胡子